



点东方色彩的存在，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们的面上。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，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。但是这里的中国，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，荒诞，精巧，滑稽。”

在《桂花蒸阿小悲秋》里她又这样描述外国人在上海的公寓：“榻床上有散乱的彩绸垫子，床头有无线电，画报杂志，床前有拖鞋，北京红蓝小地毯，宫灯式的字纸篓。大小红木雕花儿，一个套着一个。墙角挂一只京戏的鬼脸子。桌上一对锡蜡台。房间里充塞着小趣味，有点像个上等白俄妓女的妆阁，把中国一些枝枝叶叶衔了来筑成她的一个安乐窝。”

——她很明白，外国人眼中的中国，不过是东方主义，因此最受西方欢迎的英语中国题材小说，总是“东方采风录”式的。而她的英语写作，却反倒要将“传统中国的东洋镜拆穿”，为此付出了不受欢迎的代价。

## 无心插柳，柳荫影坛

漫长而寂寂无名的十多年里，命运赠予张爱玲的只有她在文艺圈内结识并成婚的丈夫赖雅（Ferdinand Reyher），两人几乎一致的穷困与不得志，促成了张爱玲的第二次“为稻粱谋”——身在美国的她，最重要的收入来源，却是为香港影坛撰写剧本。

1956年，张爱玲当年在香港结交的好友宋淇加入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，担任制片总监，拥有充分的话事权。由他邀请名作家张爱玲担任编剧，争取到的稿酬颇丰——每个剧本作价800-1000美元，够张

爱玲在美国小半年的生活费。

“一般人总想，写小说的人，编出来的剧本多半是能读不能演的。”大约是为了打破这种刻板印象，张爱玲对电影剧本这样的职业创作也交足功课。据宋淇妻子邝文美回忆：“她的写作态度非常谨严，在动笔之前，总要再三思考，把每个角色都想得清清楚楚，连面貌体型都有了明确的轮廓纹，才着手描写。否则她说，‘自觉心虚，写出来就不会有真实感。’行文运字上，她是极其用心的，写完后仍不惜一改再改，务必达到自己完全满意的地步。有时我看见她的原稿上涂改的地方比不涂改的地方还要多，一大行一大行蓝墨水，构成很有趣的图案。”

1957年，张爱玲为电懋创作的第一个剧本《情场如战场》拍摄公映，一连三周，盛况空前，打破国语片最高卖座纪录，一时间坊间感叹：名家出手，到底不同凡响。而张爱玲本人的反应却是“干了一身汗”：“因为我也觉得人家总拿我们这种人当纸上谈兵的书生。”

从1955年到1963年，张爱玲先后为电懋写了十个剧本——《情场如战场》（1957）、《人财两得》（1958）、《桃花运》（1959）、《六月新娘》（1960）、《红楼梦》（上



下图：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坐落于新罕布什尔州的群山密林中，张爱玲在这里认识了赖雅。

图片提供 / 淳子

这个看起来有点陌生的张爱玲，却又一次得到了市场的追捧，票房部部高企。

下集》（1961）、《南北一家亲》（1962）、《小儿女》（1963）、《一曲难忘》（1964）、《南北喜相逢》（1964）、《魂归离恨天》（1964）。其中八部拍成电影（《红楼梦》和《魂归离恨天》没拍成），如今存世五部（《人财两得》《桃花运》《一曲难忘》散失）。出于市场考虑，写的大都是好莱坞三四十年代流行的“screwball”喜剧，讲都会中产的儿女情长，应了张爱玲的自述：“人在恋爱的时候，是比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，也更放恣。……这就是为什么爱情故事永远受人欢迎——不论古今中外都如此。”与她的小说相比，这些电影至少表面上全无苍凉之色，轻快的节奏，戏谑的对白，用“活泼”来形容都似嫌不够，得用“俏皮”才合适。这个看起来有点陌生的张爱玲，却又一次得到了市场的追捧，票房部部高企——如宋淇所言，“都是本轻利重的上乘喜剧”。

香港电影研究者黄爱玲说，张爱玲电懋时期的电影“是窗明几净的，一不小心就会让人忘了那是张爱玲”。也许可以说，悲观的底色其实是乐观，电懋电影里的香港是张爱玲理想中的城市——清洁，现代化，人与人之间纵有矛盾也可经过一场无伤大雅的闹剧得到文明解决，最终冰释前嫌。小吵小闹但不影响家庭关系的健康，反而衬托出家人之间合该有的感情羁绊——而这样俗世化的家庭温暖，恰是她本人不曾得到过的。

不懂粤语的张爱玲，如何创作出以“鸡同鸭讲”国粤混搭为笑点的喜剧系列《南北一家亲》《南北喜相逢》？今日看起来像个谜。但毫无疑问的是，经过十部电影剧本